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遗产书写

陈 珍¹ 王 峰 灵²

(1. 青海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西宁 810007; 2. 新疆昌吉学院 外语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摘 要:十九世纪随着工商资本主义的进程,英国原有的社会结构日趋解体,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中产阶级势力逐渐壮大,贵族势力日渐式微,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成败的价值尺度。遗产继承是改变人们社会身份和地位的重要契机,由此演绎出一系列遗产纷争与爱情阴谋。作为具有时代烙印的社会现象,遗产继承成为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从奥斯汀到哈代跨越整个世纪。从历时性角度分析,遗产态度经历了从世纪初温馨现实主义的听任命运被动接受,到中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主动争取,再到中后期惊悚小说的不择手段的变化,揭示出十九世纪人们财富观念和遗产态度的流变。

关键词:十九世纪英国小说;遗产书写;遗产态度;文学表现;时代流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2-0057-06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207

十九世纪英国工商资本主义推动下的社会变革打破了原有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势力逐渐壮大,贵族势力日渐式微,门第观念不断淡化,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成败的价值尺度。遗产继承作为改变人们社会身份和地位的重要契机备受社会关注,遗产问题成为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从奥斯汀、勃朗特、狄更斯、柯林斯、哈代、史蒂文森跨越整个世纪。从历时性角度分析,遗产书写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均发生了变化,从十九世纪早期温馨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听任命运被动接受到中期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主动争取,甚至中后期的志在必得、不择手段的时代变化,在六十年代盛极一时的惊悚小说中更是演绎得淋漓尽致,揭示出十九世纪英国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人们对财富观念和遗产态度的时代流变,映衬出英国社会财富观的变迁,十九世纪英国遗产书写从文学流派上经历了从温馨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再到惊悚荒诞现实主义的三个高潮。遗产书写研究是文学与法律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国内外鲜有此类研究,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一、遗产书写的历史文化渊源

遗产继承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文学创作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在正统文学还是在民间文学中都能发现遗产书写,童话故事《灰姑娘》和《白雪公主》就隐含了遗产争夺的主题。

收稿日期:2020-07-04

作者简介:陈 珍(1967—),男,汉族,青海湟中人,文学博士,青海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王峰灵(1978—),女,汉族,文学博士,新疆昌吉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

纵观英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在中世纪一直是史诗和传奇的天下,十六、十七世纪是以莎士比亚为首的戏剧时代,同时在传奇、英雄史诗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小说文体的雏形,十八世纪,小说趋于成熟完善,十九世纪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小说类型数量、读者人数,都表现出空前规模。在创作理念和风格上,十九世纪小说主要继承了十八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手法,从不同层面通过不同主题的书写反映了十九世纪英国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其中遗产书写就是极具时代特色的重要主题。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中高频出现的遗产叙事与英国社会价值观和金钱意识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遗产财富是这个时代人们衡量社会地位和阶级身份的重要尺度。遗产继承权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决定爱情婚姻的重要砝码。因此,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的遗产书写往往跟爱情婚姻交织在一起,遗产的多少与继承权的有无决定着爱情的发展与婚姻的成败,面对遗产爱情只能屈尊俯就。另外,根据英国遗产继承法,通过婚姻可以获得并掌控女性的遗产,也出现了打着爱情婚姻旗号的形形色色的遗产阴谋案。

英国小说的遗产书写并不是十九世纪的产物。早在十六世纪托马斯·迪罗尼的《纽伯雷的杰克,英国著名和杰出的布商》(1597)中就已经出现了遗产与爱情的书写,主人公杰克在太太去世后,放弃巨额遗产与心爱的姑娘结婚,描写了中产阶级的致富经和发家史,讴歌了中产阶级的勤勉和进取精神。在十八世纪,以菲尔丁、笛福、理查逊、斯威夫特为代表的小说家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定了基础。就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遗产主题而言,十八世纪中叶菲尔丁的《汤姆·琼斯》(1749)是一部典型的具有后世影响力的佳作,作为小说的叙事主线,爱情婚姻与遗产争夺交织在一起,其中寡居的富绅奥尔华绥的老处女妹妹的丈夫布力非上尉因霸占奥尔华绥家族财产的阴谋未得逞而中风身亡。由舅父抚养的小布力非继承了父亲的秉性,为独吞财产并得到庄园主魏斯顿的独生女索菲亚,处处陷害琼斯,买通家庭律师做伪证,企图除掉琼斯,真相大白后,富绅取消了布力非的继承权,改立妹妹的私生子琼斯为嗣,琼斯与索菲亚终成眷属。小说先后涉及两代人的遗产阴谋案,情节复杂多变,离奇曲折,悬念迭生,是十八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其中谋杀、中风、诽谤、作伪证、私生子等情节为后期的哥特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了个人出身和财产继承在英国中上层阶级中的社会意义。十八世纪后期的哥特小说也热衷于遗产主题,故事情节主要为遗产风波与爱情婚姻类型,遗产争夺与婚姻阴谋构成叙事主线,几乎都以善恶有报的结局收尾,表现出主题类型化、结构程式化和情节单一化的特征,从情节设置可窥见菲尔丁的影子,代表作有贺拉斯·沃尔浦的开山之作《奥特朗托堡》(1764)、范妮·伯尼的《伊夫琳娜》(1778)、夏洛特·史密斯夫人的《古堡孤女》(1788)、安·拉德克利夫夫人的《乌多尔福的奥秘》(1794)。

十八世纪的英国沿袭中世纪的封建继承法,继承事务受到教会法、世俗法和习惯法的三重约束,采用复式继承制,即动产与不动产采取不同的继承方式。长子继承制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家族财产的完整性和封建家长制。“英国动产继承一直奉行分割继承的原则,遗产通常分为三份,妻子、子女、教会各继承一份,其中交给教会的三分之一称作‘死者的份额’。不动产继承主要是土地继承。13世纪普通法形成之后,长子继承制成为英国土地继承法的一条根本原则。”^[1]长子继承不动产和爵位之后,就成了家族首领,有义务承担维护家族利益和保护家族成员的责任,兄长必须养育和教育未成年或未独立谋生的子女或家庭成员。其他儿子和女儿一般会得到一定的动产作为遗产补偿,女子可用来作嫁妆,女子的婚姻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嫁妆的多少。婚姻顺理成章地跟遗产继承形成了密切关系,遗产继承权以及遗产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婚姻对象的选择和婚姻的成败与否。金钱观念压抑了男女美好的爱情,遗产演变为婚姻的基本筹码。资本主义工商经济不断壮大使原有的庄园采邑制度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状况,中世纪以来的长子继承制面临极大挑战和质疑,旨在彰显和保护封建采邑制和家族制的长子继承制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1925年,英国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和男子优于女子的原则,遗嘱自由原则才得到全面贯彻。长子继承制的废除加强了父母在遗产分配上的自主权,同时保证了女儿和儿子享有同等的遗产继承权。

二、十九世纪初期的遗产书写

长子继承制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这种具有时代特点的遗产继承制在以奥斯汀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初期小说家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反映,遗产书写也是这一时期家庭小说的重要内涵。奥斯汀本人因遗产继承问题葬送了美好爱情,在其文学生涯中最擅长遗产书写,《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1814)、《劝导》(1818)皆围绕遗产谋篇布局,遗产归属是推动情节发展、改变人际关系和人物命运的重要因素。遗产继承与分割是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人物内心世界、捕捉人物性格的环节和媒介,小说围绕遗产继承这个主题,细致入微地、动态地展现了众多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情绪波动,刻画了继承权牵动下多变的人物形象,暴露了财富左右下的险恶人性。奥斯汀小说中人物的死亡,往往意味着继承遗产机会的到来。小说中,随着房产的转手,许多人的社会地位会发生戏剧性变化,从绅士阶层陡然跌至社会底层或者相反。在《爱玛》中,家庭女教师泰勒小姐地位攀升,一夜暴富,而贝茨小姐则陷入寒酸境地,这是英国当时的财产继承法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引起阶级波动的因素。《傲慢与偏见》中的乡绅贝内特先生的财产主要是一处名为朗伯恩的房产,每年可得2000英镑的进项,遗憾的是贝内特夫妇膝下无子,依照当时的长子继承法,他们的房产只能由一位从未谋面的表侄柯林斯来继承,贝内特妻女仅获得5000英镑的动产,反映了恩格斯所谓的“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2]¹⁵⁸的原则。班内特太太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让女儿嫁一个有钱的丈夫,而自己的财产最终落到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手上,她对此极为不满,觉得“实在太残酷”^[3],破口大骂,几近失态。尽管女儿们多次向她解释限定继承权的实质,她觉得无法理解,一个爱财如命、易情绪化的中产阶级妇女形象跃然纸上,失落、愤怒、无奈,但终向世俗和法律低头并接受现实。

奥斯汀认为婚姻是人生“变化的起点”,社会随着外在经济的推动而变革,人物以经济的原因而结婚。金钱和地位为基础的婚姻观滋生了通过婚姻敛财致富的卑劣行径,充分反映了婚姻的“社会契约”^[4]¹¹⁵属性,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维多利亚阶级社会金钱与婚姻的辩证关系。遗产作为获取财富的重要契机和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爱情健康发展的障碍,破坏了婚姻的伦理生态。遗产继承始终牵动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波动和婚姻归宿,决定人物命运和情节走向,主人公们为了遗产不惜牺牲爱情和真情,表现了金钱面前人性的脆弱和扭曲,揭露了中产阶级对财富的贪婪。《傲慢与偏见》中继承了近10万英镑的宾利和腰缠万贯的达西自然成为适婚女子期盼的婚姻对象。《理智与情感》中的诺兰庄园的主人终身未婚,死后将庄园世袭给了侄子亨利·达什伍德,并规定继续世袭给他的儿子和四岁的孙子,给侄媳和她的三个女儿每人1000英镑的遗赠,母女三人最终被继子赶出诺兰庄园;遗产分割使她们顷刻间失去了一切,成为无家可归的人,继承权的归属直接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和人生轨迹。《理智与情感》中,爱德华母亲富孀费勒斯太太觊觎他人遗产,逼迫儿子和莫顿爵士的独生女结亲,极力反对儿子与露西结婚,因爱德华不妥协,竟剥夺其继承权。《曼斯菲尔德庄园》也是一部围绕遗产继承而展开的婚恋小说,描述了克劳福德兄妹建立在遗产继承上的婚姻观以及因此而扭曲的心理。奥斯汀遗产小说以平实细腻的笔法描写了遗产继承的家庭婚姻效应,讽刺了以遗产继承为目的婚姻陋习,揭露了英国早期遗产继承法在性别上的不平等。十九世纪早期,人们虽然有拜金倾向,但遗产关涉人员总体上还是被动无奈地接受现实,没有志在必得的刻意谋取,甚至涉嫌犯罪或挑战道德底线。以奥斯汀小说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初期遗产书写在叙事风格上一改哥特小说和伤感小说的颓废阴郁之风,以一种清新浪漫的格调温和地反映了当时遗产继承的社会现实,作为家庭现实主义小说,其社会批判和揭露表现得比较含蓄隐晦。十九世纪初期遗产书写,为英国小说从十八世纪的现实主义启蒙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高潮的过渡,发挥了桥梁作用。

三、十九世纪中期的遗产书写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左右也出现了许多遗产书写小说,萨克雷的《名利场》(1847—1848)中,女主人公立贝加秘密嫁给罗登,就是看中了他将要继承的大笔遗产。夏洛特·勃朗特184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雪莉》中,雪莉财产继承人的身份阻碍了凯瑟琳和表哥罗伯特的爱情。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1855—1857)中,老杜丽在狱友的帮助下继承了一笔巨额财产,自此老杜丽和长女开始追名逐利,游走于上流社会,突如其来的财富使他们心灵扭曲,迷失了方向。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中,善良的亨利感恩于子爵夫妇的养育之恩,毅然放弃了卡斯伍德宅邸和爵位的继承权,亨利不为金钱与爵位所动的高尚品格,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拜金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彰显了亨利的人格魅力和高贵品质。遗产像一面魔镜,能照出面对财富时的人性,遗产既能衬托出人物不为金钱所动的高尚人格,也能映射出人物拜金求富的丑恶灵魂。英国文学主要借助于遗产书写来构建悬疑情节,营造离奇氛围,揭露人性的丑陋。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遗产书写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该小说作为狄更斯城市三部曲的重要作品,讲述了一桩遗产诉讼官司——“贾迪斯指控贾迪斯”案件,揭露了英国法官和律师有意拖延案件从中渔利获益的卑劣行径,遗产纠纷案纠缠了数十年,期待从这个案子获益的人拼命发疯,最后在诉讼费耗尽了所有遗产后案子自然了结。正如约翰·贾迪斯所言,大法官庭的案件就像“发霉的芦苇”,谁靠近它谁就会遭殃,无一幸免。小说还穿插了另一桩遗产纠纷案,希罗普郡乡下兄弟二人的遗产争执上到大法官庭后,大法官庭便日益使其复杂化,当事人又无法撤回原案,最终使兄弟俩倾家荡产,两败俱伤。小说以遗产纠纷案为叙事主线,针砭时弊,暴露了英国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黑暗和执法者的丑恶灵魂,同时也讽刺了像理查德、婀达以及弗莱德小姐那些过于看重遗产最终殃及自身的人。

狄更斯早年在律师事务所的职业经历使他目睹了英国法律界的腐败和黑暗,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荒凉山庄》所描写的遗产纠纷案以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仁宁斯案件为原型,这桩马拉松式的遗产诉讼案始于1789年,到狄更斯创作小说时还未了结。狄更斯在自己主编的《家常话》杂志上曾发表了《大法官庭的殉难者》一文,抨击当时英国法律制度的腐朽,揭露了以法律为代表的社会制度的罪恶,为大法官庭制度的受害者鸣冤申屈。小说中,狄更斯巧妙地以齷齪霉烂的废品收购店来喻指“大法官庭”,以肮脏老丑的店主人喻指“大法官”,废品店最终毁于一场自动燃烧的大火,来预示大法官庭制度必定自然消亡的历史结局。不难看出,十九世纪英国遗产书写从早期到中期经历了由浪漫主义的温情讽刺到现实主义的犀利鞭挞,从人性揭露上升到制度批判,在批判对象上也发生了大的转移,从亲情关系延伸到司法体系,从一般公民过渡到执法人员,真正实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判。小说中的遗产官司还并生着另一条轴线,律师利用男爵夫人的私生女丑闻对男爵夫妇威胁图利,从表现手法上,狄更斯部分沿袭了十八世纪的风格,利用私生子情节来制造悬念,生发离奇,最大限度地吸引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主的广大期刊读者。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期刊曾风靡一时,成为文学发表的重要渠道,狄更斯本人主编期刊《家常话》和《一年四季》。与早期的遗产书写相比,这一时期的遗产小说围绕遗产继承对社会阴暗面的暴露更加深刻彻底,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批判更加客观直白,毫不掩饰地展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直击社会弊端的核心精神。

四、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遗产书写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通过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扩张,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逐步完成了资本积累,社会经历着激烈的变革,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拜金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物欲横流,金钱至上,西方社会物质不断丰富,奢侈挥霍之风日盛,精神生活却日趋贫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理论也波及人类社会,信仰开始松动,道德日渐滑坡,法律意识淡薄,教义和道德规范难以规约个人行为,

维多利亚社会的一系列社会现实在客观上为有悖伦理和法律规范的行为创造了条件。人们急功近利,利欲熏心,梦想一夜暴富,铤而走险,不择手段,企图通过婚姻的捷径华丽转身,跻身上流社会,实现提升社会身份和获取财富的目的。此时的遗产叙事折射出维多利亚社会人心浮躁、世风日下、道德沉沦的现实。合约关系与经济交易为阶级逾越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基于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斯图亚特·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提供了似乎合理的理论依据。从小说中的遗产婚姻现象可窥见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人们追求金钱财富和社会身份的扭曲心理。十九世纪中后期小说中,面对遗产与财富,主人公失去了早期小说中那份淡定,不甘命运的摆布和现实的不公,往往会主动出击,遗产书写逐渐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争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红极一时的惊悚小说中更是演变成为一种赤裸裸的不择手段,常常跟犯罪联系在一起。艺术手法上借鉴了传奇小说、哥特小说和情节剧的风格,离奇荒诞,善用巧合,以情节取胜,富有戏剧化,削弱了中后期遗产书写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批判性,展现了惊悚小说典型的荒诞现实主义叙事风格。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小说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遗产之争与“私生子”的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惊悚小说的一大文类特征。在十九世纪英国,西方法律明文规定私生子不得有继承权,也不得采用父姓,基督教教规规定私生子不得担任圣职。在基督文化框架下,私生子是违背基督教义的异类,是违反婚姻社会制度的产物,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都不会被社会所接纳,因此不受法律保护。根据十九世纪英国遗产继承制度,私生子没有遗产继承权,在王位继承上也会受到极大限制,十六世纪的亨利八世早年无子,但其私生子却无权享有继承权,因此不得不多次结婚以求子嗣。私生子现象是英国遗产书写的重要内涵,私生子的非婚生身份为遗产继承披上了神秘隐晦的色彩,私生子的非正统地位注定了不平凡的身世和来历,每个私生子背后都掩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私生子的另类身份和身世秘密是惊悚类遗产书写用来衍生拓展情节的节点。因此,私生子自然成为遗产书写的重要内涵,私生子的介入使遗产纷争情节更加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变幻莫测,充满不确定性,富有戏剧性,因此,私生子现象也成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遗产书写和制造惊悚的重要手段。私生子卷入遗产阴谋案的小说以柯林斯的《白衣女人》和《无名氏》为最,两部小说以私生子遗产争夺为叙事主线。

《白衣女人》开创了惊悚小说的先河,黑水山庄的贵族后裔帕西瓦尔的父母当年没有正式登记,不属于合法婚姻,所以帕西瓦尔属于私生子,他的子嗣身份是不合法的,按照英国财产继承法,无权继承黑水山庄。鉴此,帕西瓦尔不惜一切代价精心策划,想篡改父母结婚文件,获得合法的继承身份。最终,在设法篡改文件时,不慎引起火灾葬身火海。《白衣女人》的另一条线索是遗产阴谋案,根据限定继承权,作为利默里奇山庄的合法独女劳拉有望继承利默里奇山庄这份不动产,还享有两万英镑的动产,另外还掌握着分给姑妈埃莉诺的一万英镑。女子死亡后,其财产由丈夫和子女继承,丈夫的那份只能在生前享有使用权,死后归子女所有,如无婚生子女就由丈夫继承。帕西瓦尔伙同福斯科伯爵想假借与劳拉的婚姻,通过制造劳拉假死,阴谋获取劳拉价值两万英镑的动产,子嗣还可得到利默里奇山庄的不动产。“白衣女人”安妮是费尔利先生不为人知的私生女,是劳拉同父异母的姐妹,帕西瓦尔利用劳拉和安妮长相相似的事实偷梁换柱,安妮死后以劳拉的名义被埋葬,将劳拉以安妮的名义关进了私人疯人院。最终劳拉获救并与沃尔特结为夫妻,儿子继承了黑水山庄,实现了善恶有报的模式化结局。帕西瓦尔和劳拉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娶劳拉的目的就是看中劳拉丰厚的遗产。姑父福斯科的热情参与也和遗产利益有关,劳拉的父亲,已故费尔利先生因妹妹嫁了意大利人剥夺了她应得的那份遗产。后经劳拉劝说把一万英镑的遗产转移到劳拉的名下,劳拉死后姑母才能得到那份遗产。劳拉之死对于丈夫和姑父意味着巨额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白衣女人》是利益驱动下的假借婚姻的遗产阴谋案。《无名氏》的情节也是一部私生女遗产争夺案,由于无权合法继承遗产,父母之死使范斯通姐妹顷刻间丧失了中产阶级的身份和家庭一切财产,梅格戴伦不甘心失去遗产,决定与命运抗争,挑战不合理的遗产继承制度,她蓄意与恶人相交,假扮家庭教师,伪造书信,设计无爱婚姻,不顾一切争取遗产。惊悚型遗产争夺小说深受哥特小说、历史传奇、罪犯小说(Newgate novel)、惊悚报道、廉价恐怖故事(penny dreadful)、

家庭现实主义以及十九世纪情节剧的影响,表现出风格杂糅的文类特征。^[5]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时代文化的大语境中,受到惊悚文学浪潮的冲击和影响,哈代在多部小说中也采用了遗产主题。其《非常手段》以私生子遗产继承为出发点,演绎出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惊悚轶事;《冷漠的人》中没落贵族老德·斯坦西的儿子和私生子戴尔一起卷入了一场争夺波娜·鲍尔的爱情和城堡的角逐,企图通过婚姻获得已失去的城堡,却落了个人财两空的下场。遗产纷争是反映哈代小说惊悚特质的主因之一。到十九世纪后期,随着文艺界对惊悚小说的诟病,惊悚小说逐渐式微,遗产争夺及私生子主题逐渐淡出了小说,也没有了为遗产而丧心病狂的情节,这一阶段主要有史蒂文森的《诱拐》(1886)、《巴伦特拉加德少爷》(1889)、塞缪尔·巴特勒的《众生之路》(1903)。《诱拐》(1886)围绕大卫·鲍尔弗与叔父的遗产纠纷展开。《巴伦特拉加德少爷》中,遗产继承人大少爷詹姆士据说战死疆场,弟弟亨利继承了财产并娶了詹姆士的未婚妻,然而詹姆士并没有死,在美洲和法兰西历经一番冒险后又回到了苏格兰,为此两人结下了生死矛盾,发展到决斗,亨利以为杀死了詹姆士,结果詹姆士又一次逃生,詹姆士的两次“死而复生”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画像》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无意中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获得了独立支配财产权的故事,这种权利即为许多小说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

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变革,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成败的价值尺度,遗产继承成为改变人们社会身份和阶层的重要契机,遗产问题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十九世纪英国小说遗产书写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从世纪早期家庭现实主义小说的听任命运摆布被动接受到中后期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主动争取甚至不择手段的变化,揭示出十九世纪英国社会随着社会经济变革,人们财富观念和对遗产态度的变化,映衬出人们财富观的变迁,其文风经历了从温馨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再到惊悚荒诞现实主义几个阶段。

[参 考 文 献]

- [1] 王灵. 简析英国女性继承法的演变[J]. 科技信息, 2007(24).
- [2]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 [3] 简·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M]. 孙致礼,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 [4] Scott-Kilvert, Ian, ed. British Writer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1.
- [5] Wynne, Deborah. The Sensation Novel and the Victorian Family Magazine[M]. New York: Palgrave, 2001: 5.

Legacy Writing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Novels

Chen Zhen Wang Fengling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810007;

2.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ji University, Changji Xinjiang 831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under the impac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power became the decisive factor in defining social standing and identity, which aroused a strong sense of legacy among people. Legacy inheritance as the big concern in society entered English literature of realism, which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of fate, active struggle and even irrational scheme for legacy, reflecting the chronological change in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legacy and inherit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trends—mild realism in the early period, critic realism in the middle period and the sensation novel in the relatively later.

Keywords: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novels; legacy writing; legacy attitude; literary expression; social change

[责任编辑:孟 西]